

刷新與 循環

——二十年代的新小說研究

王喜絨 著／敦 皇文藝出版社



I207.4
39

刷新與循環

王喜絨 著／敦煌文藝出版社

(甘)新登字第06号

刷新与循环——二十年代的新小说研究

王喜斌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第一新村81号)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8.5 插页2 字数178,000

1992年10月第1版 1992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80587-108-6/I·96 定价: 4.00元

前 言

随着接受美学理论的引入中国，中国比较文学界的学者们活用这种理论，提出了编写完全不同于过去体例的新型文学史的大胆构想，这就是：新的国别文学史将由“创造”、“传统继承”和“引进”三个要素构成，并对那些“特殊的历史时刻”予以特殊的关注。这是因为在这种“时刻”里，读者的文学观念往往可以穿越或排斥以往的界限，敏于接受外来影响，改变自己的“接受屏幕”和“期待视野”，所以，它在新型的文学史里无疑将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①。法国比较文学学者伊夫·雪弗烈把这种“时刻”称之为“时代的门槛”^②。本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文坛就正处于这样一种“特殊的历史时刻”。这十年，不仅是中外文学史无前例地大交汇、大碰撞、大融合的十年，是中国文学历史被彻底刷新的十年，也是中国现代文学产生、形成和发展壮大的十年。正由于二十年代是中国文学发展历程中一个地地道道的转折点，称得上是名符其实的“时代的门槛”，这就使已经过去六十余年的二十年代的文学创作，肯定将在未来的新型文学史中大放异彩。文化界这种重写中国文学历史的最新思考和趋向，就把深入开掘和研究二十年代文学创作的任务，提到了每个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人的面前。在传统的中

国现代文学史版本中，二十年代的文学历史虽然占了不少的篇幅，但绝大部分都是以现实的革命斗争为参照系，以一个个作家的“点”，来概括和展现十年中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风貌的。这诚然有它的存在理由和长处，但这种“散点式”的透视却使人们无法完整而又系统地看到，起于1917年文学革命的中国现代文学，除过在性质上发生了“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根本变异外，作为新文学，它在文学方面又比传统文学新了些什么。依我看，这所谓的“新”，自然就包括了未来的新型文学史中必然要涉及到的两大支柱：（一）从异域文化中引进了哪些不同于传统的东西；（二）相对于传统文学，二十年代的作家们又创造出了些什么属于他们自己的新东西。而且，现代文学虽然是对传统文学的“反动”，但由于最初它又是受孕于这种传统的，加之纵使一代新型作家，他也无可避免地是纵的文化历史发展与横的文化接触面所构成的座标上的一点，这就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比，无论怎样新鲜和变异，都必然要从传统中继承和借鉴一些对自己有益的东西。这样一来，系统地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传统继承”、“引进”与自己的新“创造”，就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需要着实用力的三大课题。而作为中国文学发展历史转折点的二十年代的文学创作，便自然而然地成了人们进入这三大研究课题的“历史的门槛”。只要跨进去，既可比之于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又可比之于欧洲文艺复兴的绚丽多彩的二十年代新文艺园地，就将会奉献出您所需要的一切！这可以说是我持之以恒地把一般人不大在意的二十年代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创作，作为自己悉心研究对象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因。

把二十年代的新小说创作研究作为自己的主攻对象，还有另一个方面的原因。它虽然起源于感性层次，但却率先启悟了我深入到这一段文学历史研究中去浓烈兴趣。那还是1981年的8、9、10三个月，当我为了自己的一篇研究生毕业论文，整天伏在北京图书馆、北京善本书库的阅览桌上，在昏暗的光线下，日复一日，一篇又一篇地系统翻阅二十年代的新文学创作及其有关评论时，我便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对现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科书的“反叛冲动”。我认为：

（一）文学史教材中应该加进那些本应该有，但因种种原因——特别是政治方面的原因，却略去未提的重要内容；（二）文学史教科书中虽然涉及到了，但某些观点、结论通过时间的检验，证明是必须加以修正的，就应该迅速更新和重写；

（三）现代文学史的研究观念和方法也急待更新和突破。这种冲动就激励我在完成了自己的毕业论文后，始终无法忘却这些撩人心弦的意念，于是，在我留校专门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后，我便继续以这十年的小说创作为突破点，把脑海中萦绕不已的意念化为具体的探索实践，终于在1987年的上半年以下面六个方面的专题，开出了“中国现代文学新论”的选修课：1.新文学的“新”字中还应该增添一个本不该略去不提的重要内容；2.外国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奉献上的无保留性与后人研究回顾中的处处保留；3.现代文学研究中一个有意无意的重要忽略；4.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某些权威观点的不权威性；5.鲁迅后期杂文研究中有待开掘和深化的一个研究课题；6.现代文学研究方法上的现代化问题。我现在呈到读者面前的这本书，《上篇》中的大部分内容就基本源于那门选修课。所以在节与节的联结上，还不可

避免地留下了讲课那种特定场合下的某些痕迹。

除过上述两个原因之外，让我把自己的视线长久地投向二十年代的文学创作，还有一个更新的因素，这就是粉碎“四人帮”后的新时期十年中，诸多令全社会关注的文学现象，都可在二十年代的新文坛上找到极其相似的对应。如果打破时空界限，运用一种比较的历史眼光，对比研究这两个十年的创作，不仅可以进一步深化对二十年代文学创作的认识，还可从中探索出文学创作中某些规律性的东西。鉴于这种思考，我又把对二十年代文学创作的研究转向这个角度，继续开掘下去。很显然，本书的《下篇》就是这种视角下的产物。

以上三个方面既是本书的成因，又是它的基本内容。全书正是立足于中国文学的发展历史，在二十年代被彻底刷新，近五十年之后，又一次在这里循环升华的历史事实，对二十年代的新小说创作——一个最能反映这一时期文学创作概貌的“主渠道”，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多侧面的研究。纵向上，上溯传统，下接新时期十年；横向上，不忘中外文化交汇碰撞、东方传统观念与现代意识的冲突、融合的宏观背景，通过纵横方向上的与传统文学、与新时期十年的创作、与外来文学的比较分析，开掘出了二十年代新小说创作中一个个至今仍在熠熠生辉的闪光点，透过这一个个闪光点，人们看到的是二十年代这一块刷新了中国文学历史的闪光文学平面。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曾经得到过我的导师吴小美教授的指导。可以说正是她辅导的我的一篇研究生毕业论文：《过渡时期的觉醒者和“挣扎者”》，把我引渡到了这一研究方向。这种

师恩，我纵使千谢万谢，也难表达自己的感激于万一。此外，还有一点我不能忘怀的，这就是我在给学生开“中国现代文学新论”这门选修课时所说过的：“1936年3月18日，鲁迅在他曾经为之奔走、呼号过的《译文》期刊终于得以复刊时^③，曾经表达过这样一种真诚的祝愿：‘我们真希望在这宽容和大度的文坛里，《译文》也能够托庇比较的长生。’^④我的这一门课也正是有幸诞生在文化界的人们正在通力创造一个宽松环境和气氛的时候。”没有改革开放带来的新观念、新视角、新方法，没有自由探索与勇于创新的时代氛围，要在传统的二十年代小说创作研究的结论之外，再重新开掘出诸多新的研究层面和课题，就是不大可能的。最后，我还要衷心感谢兰州大学中文系和兰州大学科研处的同志们，正是他们的鼎力相助，才使我的这些研究成果得以正式面世！

王喜斌

1990年12月19日于兰州大学

注释：

- ①详见乐黛云主编的《中西比较文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7月出版。
- ②见伊夫·雪弗烈：《接受理论与比较研究》，1985年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
- ③《译文》期刊诞生于1934年9月，终刊于1935年9月。
- ④见《〈译文〉复刊词》，《鲁迅全集》第6卷。

目 录

前言.....	(1)
---------	-------

上 篇

历史从这里刷新

一、一个全新形象的诞生.....	(5)
二、一种全新风格的形成.....	(40)
三、面向世界的拿来和拓展.....	(61)
四、横向接受中的消化变形.....	(99)
五、魅力长存的另一种歌唱.....	(115)
六、文化哲学的介入.....	(141)
七、女性作家的独特风采.....	(164)

下 篇

历史在这里循环

一、何其相似又十年.....	(188)
二、从“怨以怒”到“伤痕”.....	(217)
三、从“零余者”到“边缘人”.....	(229)
四、从“时代女性”到“时代儿”.....	(249)

上 篇

历史从这里刷新

二十年代是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最无合理秩序、因而也最混乱的十年。然而，它却是文学得以异军突起的十年，是中国文学大步走向现代化的十年。一方面，彻底反传统的时代氛围有力地促成了人们反叛旧文学的强烈冲动，使“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由文学革命以来的呐喊，化成了具体的创作实践；另一方面，外来文化艺术与原生文化艺术的撞击，又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参照，这参照不仅引发了对传统文学的深刻反思，更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创新参照，它给反叛途中的人们提供了一片更加宽阔的文化视野；再加上千年不遇的王纲大解纽，又给文学带来了如下四个方面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①文学脱开了政治上的附庸地位，不再为“工具”的角色所困扰，因而得以重新开始自己的独立化追求；②作家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创作自由——这不仅是环境，也包括作家本人能够自由思考的心灵；③一代有着全新文学观念和现代意识的创作新人迅速崛起；④变革年代所产生的社会生活的丰富多样性和社会心理群体的趋于多元化，已使文学再也无法缚于一种艺术色调之中。于是，这诸方面的因素就共同促成了这十年的文学创作，必然是一代具有探索和创新品格的新文学称雄文坛的十年，也是中国文学的发展历史被彻底刷新的十年。而且，这刷新还并非是在传统文学的基础

上，对传统的自我改造，以强化它的生命力，而是站在传统之外，通过吸收和创新，促成了原生文化艺术传统的根本性转变。这样一来，二十年代的新文学创作，便以对传统文学的彻底反叛、以一切外来文化所采取的宽容与吸收的态度，实实在在地构成了传统文学走向现代文学的新起点，在传统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划出了一条光芒四射的分界线。可以说，二十年代的文学创作，其光辉、其功绩、其魅力，正在于此。本篇也正是在这里沉思。

然而，本篇中的内容，却并非是对二十年代文学创作刷新历史这一创举的全过程的系统探讨。这不仅表现在我所选择的思考对象，只是1919—1929年间的新小说创作，并不包括诗歌、散文、戏剧等文学样式；更在于像歌德所说过的：

“凡是值得思考的事情，没有不被思考过的，我们必须做的只是试图重新加以思考。”本篇中所包含的七个方面的内容，就都是这种重新思考的产物。中国现代文学作为极“左”思潮蔓延时的“重灾区”，它本身就给人们的重新思考提供了十分丰富的内容；时代的发展所给予人们的与昨天截然不同的艺术眼光与崭新的思维方式，又使这种思考成为可能；而且，作为文学创作本身，它虽是“已成之物”，有其客观性，但却有待于人的主观理解和阐释。而人，又不可能超越固定的时空，达到普遍与永恒。因此，纵使没有研究历史上的人为灾害，那么不断对文化遗产作出新的理解和阐述，使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依然大放异彩，这不仅是极有意义的，也是极为必要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我的这些关于二十年代小说创作刷新文学历史的研究，又仅是我本人从自己所处的时代里，找到的几个全新的研究课题。

一 一个全新形象的诞生

中国现代文学诞生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人们通常是把它称为“新文学”的。见诸于文字的，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1935年，当现代文学的先驱者们把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个十年——1917—1927年的创作、文论汇编成册时，书名便命之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即使到了解放后，一些现代文学史的专著也还是沿用了“新文学”的提法。如1954年出版的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1957年出版的刘绶松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等。

为什么中国现代文学又被人们称之为“新文学”呢？这一方面固然有个面宽面窄的问题，因为现代文学如果单从时间概念上说，就应该包括从1917年的文学革命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历史时期，敌、我、友三个方面的文学作品。可事实上，我们所讲的中国现代文学，只是包括了其中能体现时代潮流的部分，即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作品。所以，把现代文学称之为新文学，无疑也是为了体现范围上的这一差异。然而这只是一个次要的原因。现代文学其所以被称为新文学，主要是与旧文学比较而言。说它新，是由于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根本的变革——具有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性质、完成了从文言到白话的语言形式的彻底革新、在创

作的艺术技巧诸方面，都完成了从传统形式到现代形式的转变；更因一个全新的形象——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形象的兴起，由于它的出现，才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断开了一个时代。但是，过去很长时间内，受传统思维模式的局限，在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中，却较少有人能从宏观上把这一形象放到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放到二十世纪中外文化的交汇碰撞中，从新旧文学形象的演变与对比中，深入考察它的出现对中国文学现代化的重大意义，更多的则是把现实革命斗争和作家本人的情况作为两大参照系统，习惯于从“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性质”上，笼统地将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加以区别，这就在有意无意之中把文学的研究过于政治化了，它往往带给人们的，是一个与社会发展状况类同的文学发展上的大致轮廓。由于文学是人学，文学与其它社会科学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是以形象反映生活，脱离文学的表现主体“人”而探讨的新文学，就很难是完整意义上的新文学。所以，本节打算跨越现代文学史的传统历史分野，选取现代文学形成发展中的一个关键阶段——二十年代的新小说创作，对勃兴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形象来一个较为系统的正面观照。通过这种转换艺术视角的研究，重新审视一下与中国的现实革命斗争同步发展的新文学，所具有的独特内涵。

过渡时期的觉醒者

就像人们所看到的，二十年代的新小说作品绝大部分还不善于塑造典型，不习惯或者说不懂得把写性格作为一种自觉的艺术追求。然而正是这些不免带着草创期文学的缺陷与

不足的小说，却把一个全新的文学形象——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形象，引进了小说领域，让它取代传统文学中的形象，牢牢占领了二十年代的小说阵地，促使中国小说由形式到内容，迅速实现了由古典到现代的转变。那么，二十年代小说中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形象呢？如果把它与传统文学中的封建知识分子形象加以比较，我们就会看到：“后者是本色的老中国的儿女，而前者却是多少已经感受着外来工业文明的波动。”^①就是说，传统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虽然多种多样，但都有着封建社会里老中国人的某些天经地义的人生观念，而二十年代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却明显地褪去了这些传统的印记，他们已经作为接纳了西方新潮的觉醒者形象，出现在了当时的小说作品中。

正像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知识分子”^②。“五四”前夜的中国，正值历史大变革的时期。一方面，旧的封建制度及其观念正在崩溃和没落；但另一方面，一种新的制度和观念又尚未形成和巩固，这就使得古老中国处在了由旧向新的过渡时期。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正是这裂变、过渡期的产物。随着闭关自守的中国大门被帝国主义的枪炮所打开，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和各种进步思潮，也像潮水一般涌了进来。就像暗夜中的一道闪电，它在鲜明照出旧中国腐朽没落的同时，也给众多的知识分子映出了一条迥异于科举之路的新理想——推翻帝制，走西方资产阶级共和之路。再加上欧战期间发展起来的民族资本工业，又为接纳这种新潮造就了良好的土壤基础。^③于是，在中西文化交汇碰撞中逐步更新了自己观念的中国知

识分子群，便作为一代觉醒的新人出现在了转型期的社会生活中。特别是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更是年轻一代“对于近代文明发了自觉的一种运动。”^④随着这批人肩负起历史的使命，在除旧布新的过渡期中发挥越来越大的政治作用，作为现实生活反映的文学，也便自然而然地跟踪时代的脚步，让他们及时进入了二十年代的文学创作中。总观这类形象，其“觉醒”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与处世立身总以孔孟之道为本的封建知识分子不同，二十年代小说中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已经举起了个性解放的旗帜。这是这一形象的最基本的特点，也是他们走向觉醒的鲜明标志。可以说，二十年代初期关于新型知识分子题材的创作，几乎全是对一代新人所推崇的“自我”的不同阐释，通过这种阐释，构筑着一个既属于作家，更属于一切追求个性解放的人们的自我新天地。

就像周守一在《士气与国运》一文中所剖析的，“名利”二字写尽了过去读书人的人生观。由于“社会上所崇拜的是‘高官厚禄’，是‘肥马轻裘’，是‘子女玉帛’，是‘富贵功名’，是‘才名四溢’，是‘著作等身’乃至其他名利两范畴内的种种”，这就导致了一般读书人迎合社会的心理，把营求“名利”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⑤。《儒林外史》中的范进就正是这种典型。为了功名，他在科举考试中耗尽了自己的一生，纵使到了54岁的偌大年纪，还依然无法忘情这两个字，“乞乞缩缩”，再赴考场。可二十年代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却一反这种陈腐的人生观念，把追求个性的自由和解放，人格的平等和独立，作为主要精神向往。“昔之清谈谈老庄孔孟，今之清谈谈欧美新说”^⑥，他们已经开始用